

第四部分

商业及财经界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IRCLES

何善衡

低调行善的儒商



创办恒生商学书院，培育商界人才

现任恒生商学书院（以下简称恒商）副校长的区翠华，非常感激何善衡，她说：“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恩人，所以觉得自己也有重任去培育人才。”

当年创办恒商，区翠华是首批的受惠人，她忆述当时她们读书的机会很少，那时只有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而她学理科，入不到这两所大学，因为当时社会的家庭中都有很多子女，一般家庭的环境都不是很理想，多会选择供助男孩子上大学。恒商开办时，她很开心，那年她中学刚毕业，知道恒生商学书院可以免费入读。

何善衡筹办恒商之构想，其实早在1963年已萌起。当年恒生银行已开始为雇员开办为期六周的银行及商务初级训练免费课程，至1969年何善衡决定成立一所全日制学校，希望衔接中五课程。

为培育银行业界人才，当时的恒生银行总经理利国伟便开始与政府交涉，并于1974年获批地皮，兴建校舍。

学校的位置在以前算是很偏僻，交通不便，因此有需要建设宿舍。当年由何善衡基金及数位恒生银行董事捐资8,000万元，创



终年94岁的何善衡，是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83岁高龄时才卸下银行董事职位。早年香港银行界人才紧缺，他一手创办了恒生商学书院，由何善衡基金资助，免费招收有志从商的优秀中学毕业生。

办恒商，其中5,000万元用于兴建校舍和各种设施。宿舍可容200多名学生，学校有图书馆、游泳池、网球场，宿舍设施一应俱全，当时可堪称豪华校舍。

恒商创办时，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何善衡因此萌生出一个在当时来说很特别的想法。他希望恒商可以帮内地培训银行业的人才，更可使之成为一道桥梁，通过恒商可以让内地了解他们完全陌生的市场经济概念。

新华社香港分社前任副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何铭思说：“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时，何善衡说（你们）要搞企业、搞银行，一定要有入懂会计、财务，他们有些学额可给我们，他希望我们的银行及企业派人去学习。”由于何善衡当年在华资银行里德高望重，所以何铭思很早便透过其人脉网络，认识了何善衡，可惜由于当时内地体制及思想的局限，何善衡上述超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不过恒商特有的体制设置，令优秀学生有机会脱颖而出，出国深造。

区翠华当年亦是获取了奖学金，才有机会到英国留学，她忆述：“回来后，我加入恒生银行工作，当时我真没想过，何善衡博士会记得我们是第一批毕业后到恒生工作的学生。我们去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这是一次很短的对话，他勉励我们珍惜机会用

心工作。”

虽然区翠华不久便去恒商教书，但对当年恒生银行的工作环境仍然印象深刻，她个人感觉当时（1984年至1986年间）银行气氛很重情，早上银行会广播劝勉员工的箴言——《阅世浅谈》。

何善衡是有经营理念的企业家，《阅世浅谈》于1969年写成，他在书中跟后辈分享做人的体会及经验，探讨待人处世的道理，例如“如何能在商海浮沉中，经得起巨浪”、“做人要立品”等给予员工的劝勉之言。

除了著书劝勉员工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何善衡亦身体力行，用平等及伙伴的态度对待员工。何善衡善待并认真观察员工，很留意员工的道德行为，例如观察伙计是否有赌博习惯等，无德之人便不予信赖；何善衡在公开场合曾半开玩笑说：“骂太太可以，千万不要骂员工，因为员工是帮助你赚钱的”。

起家之路

这位银行大亨为何对教育事业那么热衷，他究竟是如何起家的？

清末，随着中国现代商业的兴盛，以银元银票汇兑为主业的行业应运而生，它们就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前身，在长江流域一带称为钱庄，在广东一带则称为银号。香港开埠初期，随着华商的发展，银号已经出现，据历史记载，1890年时香港的银号已约有30多家。

何善衡便是出生于那个银号兴盛的年代，1900年他出生于广东番禺，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14岁便开始工作。早期他于广州一间盐馆做打杂，后来转到一间金铺学做生意，由于他勤奋及聪明，22岁便担任这家金铺的司理，其后更自立门户，从事金融买卖业务。

黄金买卖是当时盛行的金融活动，聪明的何善衡很快以此打出名堂，并得到开银号的林炳彦赏识，因此林炳彦创办恒生银号时，作为林炳彦的好朋友，何善衡应邀合资创办银号，他当时出资最少，为1000港元，主要创办人是林炳彦。

其实林炳彦在上海另有一家生大银号，他基本上是在上海发迹，据说他一生充满传奇，而1929年林炳彦在上海被绑架获释后便考虑到香港发展，所以当时他才联同好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在香港创办恒生银号。

恒生银号于1933年3月3日成立，位于上环永乐街70号一幢旧楼，面积只有800平方米，有11名职员。何善衡忆述当年的情况：“铺面很小，设计亦十分传统，顾客只需走上三步，便已碰到柜面。”

林炳彦当时看中何善衡有敏锐的商业触觉，委任他为恒生银号经理，全权负责管理

恒生的日常运作。恒生银号在香港站稳脚后，便向广州、上海等城市发展。这时，林炳彦主要在上海管理业务，何善衡主要在广州负责。

这样，恒生银号形成了三地之间货币金银买卖兑换往来的业务，发展比较顺利，在创办第一年盈利已超过港币10,000元。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上海、汉口、广州和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因而激增，不少人急于把大洋换成港币，当时政府亦急需外汇支付抗日军费，因此代理兑换工作的恒生银号便赚了大钱，直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恒生银号被迫关闭。

恒生银号转去澳门发展，因为当时澳门是个中立区，由于那时澳门已有一家区氏家族的恒生银号，所以他们以永华银号之名继续经营，渡过了3年零8个月。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战后经济迅速复原，凭着何善衡过去建立的网络，恒生银号很快便重振声威，1946至1949年，何善衡出任金银业贸易场主席，恒生银号成为华资银号龙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与内地的汇兑业务实时中断，留在上海打理银号业务的陈震夏亦失去联络。

寻找旧员工，归还已成巨款的工资

1980年的一日，何善衡突然向何铭思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何铭思帮他寻找自1949年后失去联络的原上海恒生老员工陈震夏，原因是1949年前陈震夏有10,000元留在何善衡处，现时他要钱归还给陈震夏。

何铭思通过上海市政协找到当时在上海工商联会工作的陈震夏。在香港新华分社的协助下，陈震夏一家被安排来港，何善衡得以将这位老员工当年存在银行的工资亲手归还他。不过当年这10,000元，经过何善衡这30年的营运，已经增长了过万倍，变成超过120,000,000元的巨款。

陈震夏根本想不到旧老板何善衡一直保管着他30年前的工资，更想不到10,000元变成过亿元。这笔钱该怎样用？何善衡跟陈震夏商量说，不如将这笔钱分为3份，一部分作为家用，一部分支持内地的卫生教育事业，其余的支持香港。

陈震夏很愿意接受何善衡的建议，为国家及香港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他将捐赠的款项交由何铭思代为成立一个华夏基金会，专为支持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及卫生事业。现时香港有不少以陈震夏命名的学校，这当中亦包含了何善衡的贡献。

成立基金会，支持教育卫生事业

何铭思替陈震夏成立华夏基金会，在内地推动教育事业，何善衡见到华夏基金会的

成功，便一次出资2,000万港元交给何铭思，要求他用这些钱帮助内地发展文化、教育或卫生事业。

虽然只读过四年书，但何善衡向来重视教育，得知广州中山大学想筹建管理学院，何善衡和何铭思便与中山大学商量帮助筹建事宜，双方一拍即合。

何铭思描述：“发展工商管理学院时，何善衡支持我们，当时给予我们2,000万港元，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2,000万真是很大的数目，因为大家都姓何，他便跟我说：宗兄，你好好地去做吧，我不是要你管好这些钱，是要你好好地用这些钱，他只是交待了我两句话。”

何铭思当时便成立了一个何氏教育基金，何善衡不愿出名，就让何铭思做主席。

低调处人做事

恒生被汇丰收购后，何善衡仍然出任恒生董事长。恒生的成功，令何善衡做到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事业，但对于子女，他却不鼓励他们继承父业。他的子女都不是恒生银行的董事，他不让子女任职恒生，认为不是每人都懂做生意，做生意比打仗还惨，若你不知进退，必死无疑。

何善衡做人很低调，虽然他那么富有，但外人称呼他，不是“何善衡董事长”，而是“善伯”，从这一点可知他很平易近人。何善衡的子女，虽然没继承他银行家的衣钵，但却继承了他慈善基金的管理工作，而且继承了他低调的风格，极少露面于公众。

他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即儒商。儒商的特点是不做伤害社会的事，切勿伤害客户，做到生财有道。

何善衡常常说：“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忠诚老实。”这句话，亦确实是他一生行事做人的写照。

董浩云

世界级船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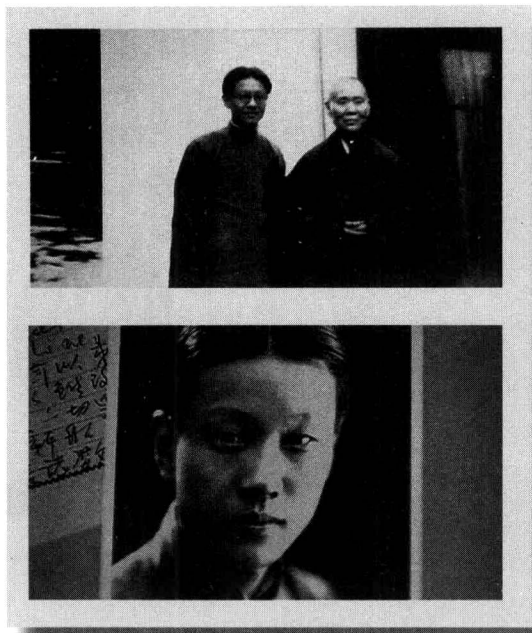
船王的日记本

船王董浩云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他去世后，女儿董建平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于是她就着手整理，并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教授编著，希望船王一生精彩的事迹，可以流传后世。

郑教授透露：“董建平主动告诉我，她有一套父亲的日记，问我这套日记有没有出版价值。日记足以反映一个人的一生，我是写历史的，当然知道日记的重要性。不论你是世界船王，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一定是很重要的史料。”

在日记中，董浩云表现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懈追求、奋斗、奉献的精神，郑教授说：“在董浩云的日记中，你可以看到他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的航运事业跟中国连在一起，他说他要为中国争取拿到第一，为中国的航运开辟一个新纪元。”

不过，日记是私人对象，加上董氏家族一向低调，对将船王的日记出版成书之事始终有矛盾。关于董家的犹豫，郑教授说出自己的想法：“董浩云是他们的父亲，他写的日记，或会涉及到家族的隐私。可是，对于香港、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他的作用真的不得了。他是世界船王，应该把他一生的奋斗、一生的追求公布出来，



被誉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不但毕生致力于建立航运王国，而且促进了中国远洋航运的现代化，他在航运史上刻下深刻的印记，虽然逝世多年，但他的贡献仍然影响深远。

让更多人了解董浩云先生的事迹。”

船王之路

董浩云1912年生于上海，上海亦是董浩云事业起步的地方，他的船王之路要从年少时说起。董浩云16岁投身航运业，从此与航运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最初他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运输公司，以及天津航运公司工作。他年少时就充满抱负，毕生致力于中国远洋航运的现代化，他的日记亦展示了一种为实现理想不遗余力的决心。他有一个愿景，希望中国商船远征国际水域，让明朝“郑和下西洋”的盛世重现，不过船王之路一点都不易走，触礁的情形是少不了。

董浩云24岁时就曾经向当时国民党的交通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国民政府对全国的航运加以统一，这样才能扩大中国航运的力量，他提出的计划非常详尽，但是当时国民政府认为并没有这个精力及财力对他的计划作出支持。郑教授透露：“尽管如此，董浩云并没有放弃，决定自己来做，可是却碰上1937年抗战的爆发，于是他的事业就搁浅了。到1939年、1940年，当时香港还没有沦陷，于是他就在香港设立了他的公司——中国航运信托有限公司，经营中国沿海及东南亚航运事业。不过，好景不常，公司成立不

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个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日本人就将之作为敌资加以没收，他公司的船全部被日本人占用了，他只好回到上海，后来退到了大后方的重庆。”

终于捱到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航运亦得以恢复，同时内地对航运的需求愈来愈大，董浩云于是重整旗鼓，拓展业务。郑教授道：“1946年8月，中国航运公司在上海复业。不久，于1947年和1948年，他旗下两艘货轮，一艘叫‘天龙号’，另一艘叫‘通平号’，相继横渡大洋，一艘横渡大西洋，另一艘横渡太平洋，两艘船上的船工全部都是中国人，中国的水手、中国的船长、中国的大副，驾着中国的船，首次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这在中国航运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到了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到台湾，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董浩云必须在这个重要的命运前途中作出抉择，到台湾去，留在大陆，还是到国外去？最后，他选择来香港。”

董浩云以香港为航运王国基地，然后把业务拓展至全世界，经过十多年光景，终于成了世界船王。

船王与家庭

事业上，董浩云是一位威风凛凛的世界船王，在背后，他也是一个亲切的爸爸，重感情的丈夫。董浩云跟妻子顾丽真虽然是透过中国传统方式缔结的婚姻，两人在订婚前素未谋面，只是通过双方家庭的共同朋友交换相片而订亲，但是结婚之后，他们非常恩爱，可以说是一对模范夫妻。不过，董浩云事务繁忙，经常要穿梭世界各地，两人聚少离多，但是董浩云无论去到哪里，不论工作有多繁重，总会打电话给妻子以解相思之苦。董浩云同时也是一个对子女既严厉又慈祥的爸爸，作为一家之主，他尽量给子女最好的教育，鼓励他们发展所长，培养兴趣。他坚持要求子女学好汉语及英文，读、写、听能力并重，令他们可以应付及面对将来的需求及挑战。

前特首董建华接受亚视专访时，曾提及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他年少时跟随父亲周游列国，领略了很多处事之道，亦明白到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他复述父亲的话：“失败的三大原因，第一是贪心，第二就是不懂用人，第三是不懂审时度势。”

专访中，董建华透露：“爸爸很少表露自己的内心，直至他过世后，我读他的日记，见到他经常提起我们，才领略到他对子女的关心。”

海上学府胎死腹中

董浩云一生努力不懈地建立自己的航运王国，成为“海上巨人”。他建立自己造船王

国的同时，也不忘栽培新血，其中在1971年斥资320万美元购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轮“伊丽莎白皇后”号，然后再用1,000万港元将其改建成名为“海上学府”的海洋巡回大学，希望在船上以新型教学模式栽培后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不但可以在这邮轮上学习，还可以共同生活，加强彼此的沟通及了解。不过，“海上学府”却未能完成使命，1972年1月9日这艘船在进行改装时突然发生大火，船只焚烧了整整一天，大火才熄灭。“伊丽莎白皇后”号随后沉没在维港中，这件事令董浩云大受打击，他在日记中以“痛心疾首”、“大为惋惜”来形容此事。

世界认同的一代船王

1982年董浩云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他突然病逝的消息震惊各界。丧礼于香港殡仪馆举行，佛教超度仪式为时3天，成千上万的人到来送别一代船王。董浩云热心公益事业，回赠社会，所以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敬仰，许多国家及世界性组织都给他颁授勋章和荣誉。包括1977年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是当时极高的殊荣，因为早在1955年，在法国的造船厂建造“东方之星”号时，董浩云就已经跟法国航运界建立了密切关系。董浩云还在美国犹他州举行的“杰出人士授奖仪式”上，接受过“金盘奖”，并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可见他的成就受到世界各地的认同。

在香港深水湾畔，董浩云有一所别墅，名叫“香岛小筑”。这座带有古代建筑园林风味的建筑物是他在50年代时购买的，并将之改建，别墅拥有面向南海的美景。董浩云闲时喜欢与亲朋戚友在这里聚会。董浩云逝世后，他的家人在“香岛小筑”增建了一座“浩云纪念堂”，它成为一代船王安息的地方。

包玉刚

环球航运船王



建立海上王国

包玉刚于1918年在宁波出生，年少时可以说跟船务扯不上关系，父亲包兆龙是经营布鞋生意的，他小学毕业后就替父亲打理生意，并开始了半工读的生涯。之后因国共内战而移居香港。在香港，他发现这是一个条件优越的港口，很适合从事进出口及转口贸易。洞悉到这个黄金商机，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航运业上。

对于一个航运家来说，在香港发展航运，有几个优良的先天条件，它是一个自由港，金融业也是自由的，融资很方便；还有香港的船员主要都是中国人，相对于西欧或美国的船员，中国的船员较刻苦耐劳，而且工资也比较低。这样有利的条件为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船公司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1955年，包玉刚用了70万美元（相当于500多万港元），买下一艘英国旧船，并创立了“环球航运公司”。包玉刚做航运虽然还不算经验老到，不过他很有远见，当时已想出“把船只长期出租”的生意构思。

对航运业有研究的城市大学讲师王炜文表示：“船只长期出租这种经营模式在当时很罕见，因为那时商家手头没那么多船，所以若跟人协商未来3年的长期租约，给予（租客）优惠的租价，需要



包玉刚跟董浩云一样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海上王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样也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两位船王的共同性就是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且并不基于政治理由，而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两个船王皆以固定模式运作他们的航运业务，对中国航运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类服务的人会觉得这经营模式在经济上较可靠，因为合约一签两年，那就可以有一个（合理）预算。当时市场需求大，将船只长期出租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为包玉刚带来庞大生意。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当时制造业也很强，很多货物要运到欧美，日本商家需要一个运输船队，他们都可以签一个长约，日本生产商认为这方法很好，因为当时的航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签一个长约租船，是较保险的做法。”

包玉刚的业务从此蒸蒸日上，既得到许多租船业务，又得到银行的贷款，令他有足

够的资金购买建造一艘又一艘的货船及油轮。10年之后，船王的航运事业又攀上另一高峰，1965年他开拓石油运输市场，取得巨大进展，多家石油公司包括埃克森、英国石油公司等大量租用他的集团船只，从此包玉刚获得亚洲航运业的控制权，在他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日益壮大。

洞悉先机转移业务

到了1976年，环球航运的船队已经有多达160艘油轮，载重量高达1600万吨，包玉刚亦被《时代》杂志封为“船王”。正当航运业处于高峰时，在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包玉刚认为运油轮将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航运业的风险日益增大，于是他从1978年开始，就决定开始“登陆”，逐步出售旗下的船只，然后又陆续将部分资产，转投到房地产、酒店及交通运输等业务上，把海上王国陆续转移到陆上商界。自此，不单在航运业，包玉刚在其他业务都大有作为。

1985年他成功收购会德丰的控制权，之后又跟霍英东、曹光彪合作成立港龙航空有限公司，又收购渣打银行。80年代初期，包玉刚成为首位担任汇丰银行董事及渣打银行副主席的华人。包玉刚在事业上称雄，在政治上也为香港回归作出不少贡献，他退休之后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运用个人的声誉和威望，在制定及实施《中英联合声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包玉刚也很重视作育英才，曾开办培育海员的学校。

两个船王——香港的龙头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在香港寓所逝世，享年73岁，当时港督形容包玉刚可能是第一位真正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香港人。有学者认为包玉刚及董浩云两位巨人，对香港航运业都贡献不少，因为航运业在香港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亦曾经作为香港的龙头及核心产业，带动及刺激了香港各行各业的形成及发展。

何鸿燊

纵横港澳的赌王



家道中落

何鸿燊在13岁时知道家庭破落了，事态严重，爸爸要避走，妈妈又哭着说没钱支持他读书，除非他拿到奖学金，才可能继续学业。当年他正在香港皇仁书院就读，他醒悟到只有读书才能扭转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凭着努力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修读理科，但却因为战乱而中途辍学。

在大学的第3年，日本侵略香港，书读不下去了，他也在香港打了十几天仗，这很危险，如果一旦日本人知道此事，就会捉他人赤柱监狱，故此他用难民的身份去了澳门。

何鸿燊没有抱怨自己有这段艰难的经历，反而觉得挑战困难是他的致胜之道。他认为如果家庭一直富有，今日未必能这么成功，他说：“当时我只剩下10元，母亲又凄凉地一直叫自己要发奋。而且，感觉有钱的亲戚都藐视我们，所以我立志一定要发奋图强。”

他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上帝很公平，只要你勤劳发奋，总有机会轮到你，机会到时你要把握。”他遇到困难后，就很懂得把握机会，澳门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何鸿燊出身于香港显赫有名的何东家族，是何东弟弟何福的孙儿，在家中排行第九。他的父亲何世光是商人，但后来因为投资失误而破产，何鸿燊亦因此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穷小子。他一生不服输，这种性格令他一次又一次能够转危为机。对于生意，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从不轻言失败放弃。

赌场得意

到了澳门，何鸿燊先在贸易公司工作，因为表现出色，很快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更获分100万元花红，他就用这“第一桶金”，独力创办澳门火水（煤油）公司，做燃料生意。之后他回到香港发展，和别人合资创办利安建筑公司，因为他相信香港地少人多，从事地产投资前景无限。5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香港有名的富豪。

1961年，何鸿燊的事业继续扶摇直上，他与霍英东、叶汉、叶德利等人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即是澳娱，竞投得到澳门的博彩专利权，建成葡京大酒店，自此开

始，在澳门垄断式经营赌场。外人见到他很风光，但他就说这一切得来不易。

1961年竞投赌博专营权牌照时，情况很紧张，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始终不愿放手，他们在葡萄牙有势力，在澳门也有势力，哪会这么简单将专营权放手给何鸿燊？他们甚至威胁何鸿燊的性命，但他仍然坚持竞投。何鸿燊忆述当时被威胁的情况：“他们警告我，如果我一定坚持要开赌场，‘就买好棺材等着吧！’我对他们说这吓不倒我，这件事全港澳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也要顾全面子，没办法不开，一定要开。”

确实，人们也是待他的赌场开场3年后，才敢前去那里。

人称赌王的何鸿燊，原来并不喜欢赌博，虽然他靠此“维生”，但他眼见很多人沉迷赌博，亦奉劝大家“小赌怡情”，千万不要过分投入。

长达40年的赌牌垄断局面，令何鸿燊累积了不少财富。这个情况到了2002年面临转变，而他的赌王地位，亦受到挑战。

2002年澳门政府决定开放赌权，发出3个赌牌，一共吸引21家公司投标，2002年2月公布结果，分别由何鸿燊旗下的澳博即澳娱的子公司，永利度假村，以及银河娱乐夺得，亦象征澳门“一人独大”的赌权专营局面正式完结。

何鸿燊对澳门开放博彩业表示欢迎，认为是良性竞争，澳门政府开放赌权是明智之举，他亦有信心每年交五十至六十亿元税，再加上另外两家新赌牌开业，澳门政府的税收数字一定会增加。

“分家”之烦恼

何鸿燊的一生，可谓赌场、情场皆得意，他共有四位太太，元配黎婉华、二太蓝琼璎、三太陈婉珍，以及四太梁安琪，总共为他生了17个子女，拥有一个大家庭。这或许惹来艳羡的目光，但对他来说，随之而来的是不绝的家庭烦恼。

他一家人最近成为城中热话“分家”的主要人物，这场风波由自称是代表何鸿燊的律师高国骏引述何鸿燊的一句话而揭开序幕。

高国骏律师说：“对于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你希望说什么？”

何鸿燊回答：“这是类似抢劫的行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签了一些他们强逼我签署的文件。”

事情源于上市公司澳博披露，大股东何鸿燊将他在澳博的大部分股权，转移给家庭成员所持有的公司，律师高国骏指何鸿燊事前并不知情，但不久赌王公开响应指他不需要律师，并指该律师已被解除职务，事件峰回路转。

何鸿燊后来再次透过代表律师高国骏，入禀控告子女、亲属及相关公司，追讨公司